政治科學論叢／第十九期／民國 92 年 12 月／頁 113　138

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辯論：
國際關係理論的另一次大辯論？*

莫大華**

摘　要

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正在進行第四次的理論大辯論，建構主義與理性主義是此次辯論的主角，雙方辯論的焦點在於物質因素與理念因素的爭議、關於國際制度的爭論、關於認同與國際規範的爭論、後果性邏輯與適當性邏輯的爭論，以及因果解釋與構成解釋（理解）的爭論。同時，此次大辯論可能發展趨勢會是重組國際關係研究學科本身，而以經驗研究為主，雙方理論的相容與折衷混合。

關鍵詞：國際關係理論、反思主義、建構主義、理性主義、後現代主義

壹、前　言

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在一九八〇年代的第三次大辯論中，引進社會科學其他學科的理論，作為國際關係理論知識論與本體論的論述，特別是質疑主流理論（現實主義）的實證主義哲學基礎（莫大華，2000）。這些新引進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所造成的後果，不僅產生國際關係學科研究界限的問題，（MacMillan and Linklater, 1995）也迫使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者除了必須閱讀國際關係學者的著作外，也必須閱讀這些人文社會科學學者的著作，尤其是其理論的哲學基礎。然而，人文社會科學的哲學

* 本文曾接受國科會《NSC 92-2414-H-135-001》專案研究計畫補助，特此致謝。
**政戰學校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
收稿日期：92 年 6 月 26 日；通過日期：92 年 10 月 22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理論滲透到國際關係理論的趨勢已日趨明顯，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者要掌握此趨勢，終究不能不探索相關的哲學理論。雖說如此，但國際關係理論歷經三次大辯論之後，仍然未能對於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有所共識。不僅是學者個人之間的爭論，各理論之間的爭論也依然層出不窮（莫大華，2000）。大多數學者認為目前是第三次大辯論的末期，但有些學者則有不同的觀點，例如威佛爾（Ole Waever）認為有四次大辯論，第三次是一九八〇年代的「理性主義」（rationalism）與「反思主義」（reflectivism）之辯論，第四次是一九九〇年代的「理性抉擇論」（rational choices）與「解構主義」（deconstructivism）之辯論（Waever, 1996）。霍立代（Fred Halliday）認為一九八〇年代後期，後現代主義的引入國際關係理論，可算是第四次的大辯論（Halliday, 1994: 37-38）。[1] 梅瓜西卡（Bice Maiguashca）則認為第四次大辯論是後實證主義陣營內的批判理論與後現代主義之間的辯論，並現已陷入停滯，但女性主義將有助於突破停滯（Maiguashca, 2000）。因此，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是否正進行著一場第四次的大辯論呢？

無論學者有何不同的主張，但隨著建構主義理論的著作不斷出版，以及出現在國際關係研究刊物，遂引起學者關注與討論。建構主義雖出現於第三次大辯論中，但也從其他後實證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中脫穎而出。根據艾達爾（Emanuel Adler, 2000: 98-100）的看法，建構主義的興起是因為，第一，權是社會學在冷戰時期前輩引進國際關係研究；第二，在一九七〇年代末，某些激進的建構主義者運用法國後結構主義學者觀點，震撼了國際關係研究社群；第三，國際關係理論原有的歷史淵源，例如杜意奇（Karl Deutsch）、哈斯（Ernst Hass）……等人與「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學者的著作。換言之，建構主義並不是憑空產生的新理論，而是源自學者不滿於既有的主流理論，遂引用其他學科理論與國際關係理論，企圖突破既有的理論困境而提供另類的理論觀點。有學者就預言，國際關係理論辯論的主軸將會是理性主義（rationalism）與建構主義的辯論（Katzenstein et al, 1999）。遂不斷有學者對此議題進行研究，儼然這場大辯論已經到來。

對於此次的大辯論，國內國際關係研究學界自當予以關注與重視其發展趨勢。國內學界正逐漸關注建構主義理論時，從引介其理論觀點到個案研究運用，已有十餘篇著作出版，[2] 也對於國際關係理論大辯論有了初步的研究。如今面對第四次國際關係理論大辯論的到來，作為一位研究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學者，不可避免地也必須要能有嚆矢之效，就此次大辯論提出觀察與初步研究心得。因此，本文區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確認辯論雙方的組成，包括理性主義的意涵、建構主義是不是反思主義的議題，以及後現代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關係，提出個人的分析，藉以鋪陳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辯論對位關係，以避免爭執或混淆國際關係理論研

[1] 他並不是明確地主張，因為他以雙逗點（“ ”）標誌第三次與第四次大辯論。

[2] 袁易（1999、2001、2002）；莫大華（1999）；黃旻華（2000）；莫大華（2000）；袁鶴齡（2000）；鄭端耀（2001）；石之瑜（2001）；盧業中（2001）；林文斌（20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究中的理性主義或建構主義之意涵。第二部分論述雙方的辯論議題，以理解雙方的立場主張，並提出個人評析。第三部分就此次大辯論的可能發展趨勢，提出個人的觀察。

貳、辯論雙方的對位關係：建構主義是不是反思主義的爭論？

必須先行指出，本文所指稱的理性主義是指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而非懷特（Martin Wight, 1991）所稱的理性主義格勞秀斯（Grotian）傳統。[3] 新自由主義與新現實主義之所以會被學者合稱為理性主義，相當程度地是受到基漢（Robert Keohane，1988）對國際制度研究途徑－理性與反思研究途徑歸類，以及威佛爾（1996）有關「新新綜合」（neo-neo synthesis）觀點的影響。但必須理解新自由主義與新現實主義各自仍有其內部的理論差異，例如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或後古典現實主義（postclassical realism）、後現實主義（post-realism）、[4] 評估的（evaluative）政治現實主義、[5] 攻擊型（offensive）與防禦型（defensive）的現實主義。[6] 自由主義內部也是有著許多不同的差異，例如激進的自由主義、批判的自由主義。[7] 同樣地，建構主義亦復如此，學者除了定義建構主義之外，也基於其各自的研究目的而對建構主義進行分類，並將建構主義學者予以歸類，藉以呈現建構主義內部的理論差異（莫大華，2002）。然而，這些理論學派的內部差異，並不影響國際關係理論學者構建一場不同理論之間的對話或辯論，甚至學者以總體論述理論學派內容也是研究國際關係理論的常態。

在構建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辯論之前，實有必要對於兩者之間的對位作一區別，也就是說辯論雙方的相對位置。例如有些學者將國際關係理論區分為理性主義、建構主義與反思主義，主張建構主義能在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建立溝通橋樑。因為建構主義注重於理解物質的、客觀的與主觀的世界在實體的社會建構中的互動過程，以及探索行為主體與結構相互建構的過程（Adler, 1997）。不僅如此，

---

3 有關此理性主義傳統的內容，參閱 Linklater (2001)。

4 Rose (1998)；Brooks (1997)；Beer and Hariman (1996).

5 評估的政治現實主義是批判的、相互整合一致、熟知理論傳統，主張國際關係應藉由促進反思的哲學與準哲學的解答來決定學科內容；強調日常生活的解釋；以歷史作為理解與詮釋日常生活的方法；準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倫理觀。Spegele (1996)。

6 Jack Snyder 是首先使用攻擊型與防禦型現實主義的學者，參閱 Jack Snyder (1991)；Lynn-Jones and Miller (1995)；Frankel (1996)；Mearsheimer (1990, 1994/1995)。

7 Richardson (20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也有學者之間對於建構主義是不是反思主義產生批評，例如史密斯（Steve Smith），他曾與溫特（Alexander Wendt）關於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本體論與知識論孰先（which matters）有所爭論，[8] 就建構主義學者而言，本體論是先於知識論。然而，對於溫特主張將建構主義作為反思主義（後實證主義）與理性主義（實證主義）之間的橋樑或中道，他批評溫特是無法如其所主張，因為第一，溫特狹隘地界定利益與認同，也就不那麼是建構主義者，他是色彩淡薄的建構主義者；第二，溫特是以新現實主義觀點界定世界政治；第三，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對於建構知識有著不同的觀點是無法混合的；第四，溫特的結構意涵是相當特殊的種類，其理念意涵是高過物質意涵的；第五，溫特認為互動過程創造認同，但批評者認為是認同先於互動。更重要的是，溫特是個理性主義的現實主義者，他只是運用許多反思主義者的概念與詞彙而已（Smith, 2001: 245）。

因而，史密斯認為反思主義的各理論並不像理性主義理論累加成一個理論立場，也更無法將兩者混合。此外，反思主義的各理論也沒有像理性主義各理論擁有相同的建構知識觀點。所以，展望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間的辯論是低的，兩者是以非常不同的方法觀看世界政治（Smith, 2001: 247）。然而，古日尼（Stefano Guzzini）認為建構主義的中心構成（central component）是「反思性」（reflexivity），建構主義正循著基漢、紐菲德（Mark Neufeld）、哈金（Ian Hacking）及布勞岱（Pierre Bourdieu）的路線呈現此概念。因此，建構主義應以「反思的後設理論」（reflexive meta-theory）來理解，他遂以「雙重詮釋」（double hermeneutics）方式，從觀察層次、行動層次及此兩層次的關係區別出建構主義的理論一致性，在觀察層次上，它是有關知識的社會建構（知識論上）與社會世界的社會建構（本體論上）；在行動層次上，它假定了一個相互主體的分析單元（intersubjective unit of analysis）；在兩者之間上，它是一種相互主體的權力分析（power analysis）（Guzzini, 2000: 155-174）。

從史密斯與古日尼的論述中，即可發現學者對於建構主義是否為反思理論的觀點仍有不同，其間涉及對建構主義的定義、各類建構主義代表學者的觀點，以及對於反思性的認定。其實，誠如阿伯特（Mathias Albert）所言，各式各樣建構主義的區隔在於有關科學觀察的反思程度（Albert, 2001: 106）。換言之，建構主義是具有反思性的理論，不同類型的建構主義學者所具有的反思性是程度的差異而已。況且，史密斯只以溫特來論述建構主義，更重要的是，他先認定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規範性理論、批判理論與歷史社會學等理論屬於非實證主義或反思主義，而將建構主義置於兩者之間，因而批評溫特不是反思主義者。事實上，國際關係理論研

[8] 這場爭論始於 Wendt 評論 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接著連續引發學者對於行為主體與結構，以及分析層次問題的爭論，其中 Roxanne Lynn Doty 與 Colin Wight 也引發一場論戰。參閱 Wendt (1991, 1992b)；Hollis and Smith (1991, 1994, 1996)；Hollis (1992: 187-188)；Patomaki (1996)；Jabri and Chan (1996)；Chan (1998)；Doty (1997, 1999)；Wight (1999, 2000)。

臺灣華藝學術期刊資料庫

究學者中，對於反思性研究最深入的學者，莫過於紐菲德以反思性評論第三次大辯論的成就，所謂反思性是指理論化過程中的反思（reflection on the process of theorizing），他進一步以「理論反思性或反思的理論化」（theoretical reflexivity or reflexive theorizing）與孔恩（Thomas Kohn）的典範概念，作為評論第三次大辯論的基準。就國際關係理論而言，反思性可從三項核心組成來理解：①對有關前提基礎的自我注意（self-awareness）；②對他們所主張的典範所具有的政治—規範面向，以及規範性科學的傳統，都能認知；③在缺乏中立的觀察語言中，仍有可能理性地判斷各種爭論中的典範之優點（Neufeld, 1994: 13-18; 21-28）。就此意涵而言，建構主義是可以納入反思主義的範疇，或建構主義是反思主義的一種型態。

綜合上述，建構主義是屬於反思主義的範疇而與理性主義處於分立的位置，但這並不意味著建構主義與理性主義兩者是處於零合、兩極的位置，而是學者藉以有助於論述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對於相關議題的不同主張。

參、後現代主義與建構主義的關係

同樣地，對於反思主義中的後現代主義，也必須先行論述其與建構主義之間的關係，以避免在論述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辯論時，產生歸類的困惱與混淆。後現代主義可被視為是一種歷史範疇、文化範疇、心態和思維模式、生活方式、表達方式和論述策略，以及「去正當化」程序（高宣揚，1991: 3-105），它源自於藝術而擴延到文學、社會思想、經濟學、建築學及宗教等領域，[9] 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也影響到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然而，國際關係學者對於後現代主義則是各有各的觀點與詮釋。艾偕里（Richard Ashley）、窩克爾（Rob. B. J. Walker）、迪爾迪蘭（James Der Derian）、坎培爾（David Campbell）、岈皮羅（Michael J. Shapiro）及巴特森（Jens Bartelson）等人的著作是探索後現代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關鍵，他們自稱是「異議思想」（dissident thought）、「放逐語言」（language of exile），但對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則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這些學者受到其他學科的哲學理論的影響，而逐漸運用於國際關係的研究，例如艾偕里受到法蘭克福學派與法國思想家的影響，他的著作先是受到批判理論的影響，而逐漸轉為後現代主義的觀點（Brown, 1999: 60-61）。

一、後現代主義的定義與內涵

有位國際關係學者就指出：「（國際關係學者）不僅贊成者與批評者之間對於後現代主義的定義與意涵有所爭議，在贊成者之間亦有所爭議。……如果關於後現

[9] 國內引譯後現代主義作品中，個人認為最淺顯的入門書是黃訓慶譯（2001）；王晶譯（19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代主義有任何明確的事，那就是其定義與意涵會是大辯論的源頭。」（Devetak, 1996: 179-180）雖說如此，但不論後現代主義的國際關係研究學者在研究上有多大的差異，他們之間仍有共同的哲學方法與哲學觀，那就是後現代主義的哲學觀與方法了。

國際關係學者多引用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 1984: xxiv）的觀點，界定後現代主義為「對後設敘述的質疑」（incredulity towards metenarratives）。進而主張後現代主義是一種知識論與方法論的立場（Bleiker, 1998: 478-479）。這也正是本研究所採取的觀點，認為後現代主義是社會研究的方法，它所強調的是反基礎論的知識論，以及詮釋的方法論。

在知識論上，後現代主義涉及到國際關係理論的基礎問題（question of foundation），所出現「基礎論者」與「反基礎論者」的爭論。也就是我們是否相信世界能以中立或客觀的程序予以測試或評估，前者認為所有的真理主張皆可判定真偽，後者則認為真理主張是不能判定真偽，因為是不存有客觀的立場來判定（Smith, 1995: 29-30; Doucet, 1998: 289-310）。其實所謂的「基礎問題」乃是「知識論」的爭論，基礎論者是認為知識或真理可以判定真偽，反基礎論者則主張知識或真理無法判定真偽，因為各種理論各有其立場，沒有中立的根基來判定知識的真偽。基礎論者探究的是各種知識的「後設理論的根基」（metatheoretical ground），以判定知識的真偽；反基礎論者則不認為如此（Smith, 1997: 167-168）。後現代主義是以反基礎論為基礎，質疑國際關係主流理論（特別是新現實主義）的後設理論敘述，重新解構或建構其本身的後設理論觀點。

在方法論上，後現代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引進後現代主義的詮釋論的研究方法，例如族譜學（genealogy）、文本（text）、相互文本（intertextuality）、解構（deconstruction）、雙重閱讀（double reading）、敘述（narrative）、論述（discourse）作為研究國際關係的方法，藉以呈現後現代的國際關係本質。例如窩克爾運用解構方法的二分法（例如在內外之間（inside/outside）、異同之間（identity/difference）、吾類與他類之間（self/other, us/the others）、合分之間（unity/diversity）、普殊之間（universality/particularity）說明國家主權原則及其何以成為的國際關係重要概念（Hansen, 1997）。迪爾迪蘭（Der Derian, 1989, 1991, 1992）廣泛地以電視影像、噪音、模擬與電影等資料作為文本，運用相互文本方法批判分析美國的外交政策。根據修易斯曼斯（Jef Huysmans, 1997: 354-355）的看法，迪爾迪蘭相互文本的核心主題是一個失序問題的復合體（a complex problematics of disorder）他的相互文本運作著一個失序中的行動，在同中求異（defamiliarize the familiar）及使正統轉為異端。並嘗試創造國際關係研究的紊亂，藉以呈現秩序來自失序，失序又如何再接續著秩序。

然而，誠如艾偕里和窩克爾（Ashley and Walker, 1990: 378-379）所言：

> 眞理的可能性是受到質疑的，每一個呈現並不是複製或恢復在其他時間或空間所眞正出現的事物，而是呈現其他各種的呈現，沒有一個是原版的，每一個都是獨斷的，並且沒有一個能排除其他的各種呈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後現代主義在知識論與方法論上的主張，威布（Keith Webb, 1998）就歸結指出後現代主義具有拒絕實證主意、提倡反基礎主義、提倡多元討論（multi-vocal discourse）、對異同問題（the question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的語言分析等特性。此外，根據喬治（Jim George, 1994: 192）指出，後現代主義國際關係學者研究環繞在四類關注：

> 第一，強調開展對國際關係傳統與學科的偉大文本進行批判的質疑；第二，著重於挑戰基本的現實主義概念，例如主權、無政府狀態，以及異類性的建構（the construction of Otherness）；第三，關注於後現代主義者所面對的後冷戰時期的戰略與安全議題；第四，簡略論述抵抗的後現代政治在國際關係研究的本質與展望。

對於後現代主義的內涵有了初步的認識之後，即可理解後現代主義與建構主義的基本特質與研究關注，並無非常大的差異，只是後現代主義對於方法論的重視，引進許多後現代主義詮釋論的研究方法；以及後現代主義強調國際關係反基礎論的知識論立場。

二、後現代主義的批評

國際關係學者卻對於後現代主義的觀點，以及對國際關係研究的貢獻有著正反意見共存的評論。特別是對後現代主義的批評，使後現代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面臨主流理論的反擊外，也引發其內部的爭論。

歐斯特魯德（Oyvind Osterud, 1996: 387）指出後現代主義的知識論與本體論是躲藏在濛霧之中（hidden in foggy formulations），這濛霧在沒有哲學專業訓練學者所寫的國際關係著作，尤為濃厚。加爾威斯（Darryl S. L. Jarvis, 2000: ix）更認為後現代主義只有使國際關係學科所進行的議題、問題與爭論更加遲鈍。它是語意混亂而令人討厭的習作（exercise），並進一步遮蔽了國際關係的主題，使此主題迷失在一種（歐洲）大陸的專業行話（vernacular）。

霍立代（1988：77-80）就認為後現代主義是「理想主義者的遁辭」（idealist evasion）。史皮格（Roger D. Spegele, 1992）更指出艾偕里的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第一，過於誇張、邏輯不精確與不一致；第二，詮釋法國後結構主義學者的著作有誤；第三，雖自稱不是烏托邦的思想家，卻又承諾於解放（emancipatory programs）；第四，雖自稱不是倫理相對主義者，但卻趨向於新尼采式的倫理相對主義；第五，對理性與真理的觀點不一致；第六，對其思想與啟蒙運動的關係交代不清。特別是未能考量與啟蒙運動激烈決裂的後果，致使其後結構主義觀點是烏托邦主義、相對主義與不理性主義（irrationalis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後現代主義與建構主義的匯合

針對後現代主義所遭致的批評，有些學者就嘗試提議後現代主義與建構主義進行匯合，企圖藉由建構主義重新反思後現代主義的觀點。恰克爾（Jeffrey Checkel, 1998: 325）曾言，建構主義已經從後現代論者手中拯救出認同研究。派斯（Richard Price） 和李爾斯特（Christian Reus-Smit）為說明建構主義能補強批判國際理論（critical international theory），在概念精緻化及經驗性研究的弱點。就以批判國際理論的現代論與後現代論的知識論區別，將建構主義也分成現代論與後現代論兩類（Price & Reus-Smit, 1998: 267-270）。有些建構主義學者在面對後現代主義論者挑戰時，也明顯地企圖吸納（co-opting）後現代主義（Pettman, 2000: 12-25）。即使是「英國學派」學者傑克森（Robert Jackson, 1996: 213）也主張以反基礎論的後現代理論建立批判的國際社會理論。有些學者甚至將艾偕里和窩克爾歸類為後現代論者（postmodenist）的建構主義（Wendt, 1992a: 393-394；1999: 3-4；Ruggi, 1998b: 240-242）。然而，後現代主義重組現代主義理解的基本問題，其所強調的不在無上的主體（即作者／獨立國家）或是客體（即獨立世界／文本），而是在建構出主體與客體（和理論與實踐、事實與價值）的歷史、文化與語言的實踐（George, 1994: 192）。

建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匯合是否會是國際關係理論的新發展趨勢呢？對於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又有何影響呢？尤其是在學者如何掌握國際關係理論的哲學論述與評析上。這些都是目前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所欠缺，而卻是必須探索的重要議題。況且，歐夫（Nicholas Onuf, 1989: 40-43）在建構其建構主義時，就曾以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作為基礎，也多次引述艾偕里的觀點。誠如建構主義所主張，可以藉由對話與溝通來社會建構這些重要的議題，以達到相互主體的一致。

綜合上述，本文將建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視為一體，在行文之間，並不刻意地去區分其差異，而是將後現代主義認為是較為激進、極端的建構主義，也就是極度強調反基礎主義、理念主義與實踐及解放的建構主義。

肆、辯論雙方的辯論議題與評論

關於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辯論議題，學者存有不同的觀點。依據霍布森（John M. Hobson, 2000: 145-148）的看法，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爭論在於物質論的行為主體中心觀 vs.社會規範的結構觀、柔性的（malleable）國家認同體 vs.固定的國家認同體、管制的（regulatory）規範 vs.組成的（constitutive）規範的不同觀點。費爾翁（James Fearon）和溫特則認為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爭論展現在物質因素 vs.理念因素、後果性邏輯（The Logic of Consequences）vs.適當性邏輯（The Logic of Appropriateness）、有用規範（norms as useful）vs.權利規範（norms 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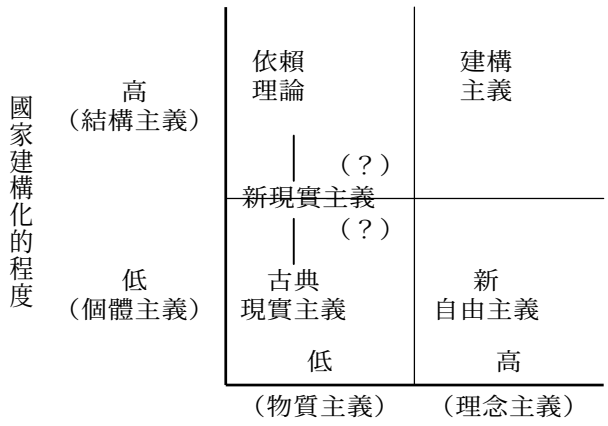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ight）、外衍（exogenous）解釋 vs.內發（endogenous）解釋、方法論個體主義 vs.方法論整體主義、因果解釋 vs.構成解釋等議題之間的爭論（Fearon & Wendt, 2001: 58-67）。

本文則分為以下的幾項議題論述雙方的爭論焦點，以理解雙方的立場主張。

一、物質因素與理念因素的爭議

就理論對國際體系的結構及其社會性而言，建構主義比起其他國際關係理論來，在國際體系的結構性與此結構的社會性是較高的，依賴理論則是結構性高、重物質性；新自由主義則是結構性低、重理念；古典現實主義是結構性低、重物質性；新現實主義則是未定（Wendt & Friedheim, 1995: 692-694）。這意味著建構主義對於理念（idea）與結構之間關係的重視，也就是說，它認為行為主體之間的理念受國際體系的結構影響，但也會反而影響國際體系結構。根據建構主義的觀點，新現實主義既是物質論也是理性主義，新自由主義則是理性主義而不是物質論。因此，就整體而言，建構主義對於理念因素與物質因素作用的觀點，並不是截然二分的觀點，例如爹斯勒（David Dessler, 1999: 126-127）就批評溫特等建構主義者對物質因素與理念（社會）因素的二分法，這兩者並不是對立的分類，新現實主義是以社會詞彙來概念化物質因素，並且新現實主義也未否定社會結構中的規範、價值與認同的重要性。有關此議題的爭論，在一九八八年夏季號的《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期刊，迪席（Michael C. Desch, 1998）發表一篇關於理念因素作用的文章，接連著引發幾位學者的爭論理念因素與物質因素的作用，迪席回應其本意是說明理念因素與物質因素之間的互補作用。這說明了學者對於此議題的主要立場與觀點。



資料來源：Alexander Wendt and Daniel Friedheim, “Hierarchy under Anarchy: Informal Empire and the East German St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9, No.4 (Autumn, 1995), p.693.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關於國際制度的爭論

基漢提出國際制度的兩種研究途徑（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之後，學者就習於以此分類區分不同的研究途徑。理性主義認為制度是提供理性行為者動機的遊戲規則，以追求其偏好；建構主義則是擴大制度的定義，認為國家的基本制度（fundamental institutions）是受到國際社會間的相互主體價值所影響，並在文化與歷史上的考量上，而有不同的基本制度（Reus-Smit, 1997）。若從本體論與知識論觀察，兩者的制度論觀點差異更大，理性主義者是以自利的（self-interested）行為主體進行策略抉擇；建構主義則是以考量其他的（other-regarding）行為主體進行慎重的動態互動（deliberative dynamics）（Jupilles et al, 2002）。

國際關係學者運用建構主義研究歐洲整合，認為建構主義比理性主義具有較廣泛且深層的本體論，較能理解歐洲整合過程中對於歐洲國家體系的轉型之影響，包括認同、社群與集體意圖的形成（Christiansen et al, 2001）。但根據波拉克（Mark A. Pollack, 2000）的看法，理性主義仍是研究歐洲整合的主流研究途徑，因為理性主義能模組化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之間的互動，包括全球化對國內行動者偏好與政治後果的影響、個別國家內部制度內的偏好累積，以及政府首長的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偏好，還有引用理論概念豐富國際關係理論，以及減少國際關係理論傳統的偏狹與異例，但建構主義則尚未如此成功。不過，魯基（John Ruggie, 1998）則批評新效用主義（及理性主義），認為社會建構主義以其強調行為主體與結構之間的相互構成、構成性規則、相互主體的互動形成利益與認同，則可以超越新效用主義。其實，理性主義之間的制度論觀點差異，是可以從問題導向（problem-driven）、經驗取向（empirically-oriented）的觀點，研究特定議題與建立中層理論（middle range theory），而非聚焦於後設理論的爭議，則兩者之間的差異是可以超越的。例如席門爾分尼（Frank Schimmelfennig, 1998/1999）以建構主義解釋北約東擴的原因，認為北約是西方自由民主及多邊價值與規範的社群的一個專業化組織，東擴代表著是一個國際社會化的過程，東歐國家藉此國際社會化過程而加入西方社群。但他也認為建構主義的解釋與理性主義的解釋並不必然互斥而是可以相互混合。這就是一個例子。

三、關於認同與國際規範的爭論

建構主義重視認同、規範（norms）與文化在國際關係的形成過程與作用，包括從個人認同、國家認同到國際認同的認同化（identification）過程（Bloom, 1990；Wendt, 1994）。它所思考的是在於國家是否來自一個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不同的主權國家能形成一個集體認同嗎？建構主義學者認為經濟互賴、共同的外部敵人、共同的內部敵人等等（Wendt, 1994；Owen, 1998），促使國與國之間產生集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體認同，願意接受國際規範、限制國家行為。溫特（1994: 384-396）並以整體認同（corporate identity）與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說明社會集體認同（societal collective identity）的形成過程，也就是行為者藉由集體行動在結構系絡（contexts）、系統過程及策略實務的三種機制內，創造自我利益與集體利益而形成社會集體認同。柯爾（Colin H. Kahl, 1999）以集體自由認同體（collective liberal identity）觀點解釋「自由和平假設」（Liberal Peace Hypothesis），認為自由民主政體不會相互發生戰爭。利斯卡平（Thomas Risse-Kappen, 1995）也以建構主義的規範性觀點解釋何以民主國家介入戰爭或軍事衝突，認為民主國家的和平自我認知所形成的民主規範主導其國內的決策過程，以及形成其在國際關係的集體認同，並將這些規範外化於民主國家的相互交往，進而強化和平的前提假設。

建構主義相當重視規則與規範的形成與作用，他們認為國際規範有著社會意涵（social content），而且獨立於權力分佈之外，並作為國家認同與利益的基礎（Nadelmann, 1990；Finnemore, 1993；Katzenstein, 1996）。規範建立了對於行為者在特定環境下的期望及行為，進而影響其認同、利益與政策（Jepperson et al, 1996）。若是以對話（dialogue）隱喻政治，則語言對話的相互主體原則，使理性行為者（國家）在相互主體的社會結構或規則下溝通行動，並進行有效地傳遞意義，創造一個無須以戰爭解決爭端、相互信任的安全社群。因為行為者藉由對話建立了政治社會的規則，規則又約束了行為者（Frederking, 1998）。尤其是國際規範藉由國家內部的政治程序或政策辯論而對於國家行為有所影響（Cortell & Davis, Jr., 2000: 65-66）。例如費尼摩爾（Martin Finnemore, 1996）就認為人道主義的國際規範，形成國際組織或國家對於人道軍事干預的行為，國際規範改變，則干預行為也會隨之改變。可以說建構主義主要在研究規範（norms）的擴散（diffusion）與影響，在此擴散過程中，國際規範藉由國內結構、擴散機制及社會學習而產生了構成性效果（Checkel, 1999；Rise, et al, 1999；Risse, 1998）。

理性主義則認為國際規範影響到國內社會行為主體的動機與誘因，進而限制其行為（Moravcsik, 1995；Cortell and Davis, 1996），無論是自由制度主義主張絕對利得（absolute gains）或是現實主義強調的自我利益或相對利得（relative gains）（Grieco, 1988, 1993），都誠如包威爾（Robert Powell, 1991）所言，絕對利得與相對利得爭論的真正問題是關於國家偏好。窩席（James I. Walsh, 2001）就觀察歐洲貨幣整合，發現建構主義較能解釋國家偏好在國際制度創立或變遷的作用過程。換言之，理性主義認為國家偏好決定了國家對於國際規範與認同的選擇。此項觀點正是建構主義所主張的，「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成的」（Wendt, 1992a）、「安全是我們造成的」（Booth, 1997: 106）。

四、後果性邏輯與適當性邏輯的爭論

國際關係學者也引用組織理論學者馬奇（James G. March）的後果性邏輯與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當性邏輯，以及經濟人（*homo economicus*）與社會人（*homo sociologicus*）的觀點，論述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差異（Checkel, 1999；Risse & Sikkink, 1999），所謂後果性邏輯或經濟人是指以抉擇為基礎的決策（choice-based decisions），是以事先的偏好評估各項選案的後果而作出抉擇。適當性邏輯或社會人是指以規則為基礎的決策（rule-based decisions），是以認定情勢與遵守符合情勢的適當行為之規則而實現認同體或角色（March & Olsen, 1989, 1998；March, 1994）。理性主義是以後果性邏輯為思考，強調行為的效用；建構主義則是以適當性邏輯為思考，強調行為的適當性。簡言之，理性主義認為行為主體係以手段與目的的理性成本分析，計算其利益或最大效用而採取行動或決策。因此，魯基就以新效用主義（Neo-utilitarianism）稱述新自由主義與新現實主義（即理性主義）（Ruggie, 1998）；建構主義則認為行為主體是以其認同體、系絡（context）與適當行為的相關規則或規範而採取行動或決策。

米其爾（Ronald B. Mitchell, 2001）就以適當性邏輯與後果性邏輯說明國家順從國際規範的過程，特別指出適當性邏輯較能說明違反國際規範的國家如何轉為順從的過程。然而，馬奇和歐爾森（Johan P. Olsen, 1999: 312-314）就指出，後果性邏輯與適當性邏輯之間的關係並不是互斥的，政治行動是無法用單一邏輯來解釋，因為兩者之間的關係包括一個清楚的邏輯主導另一個不清楚的邏輯；一個邏輯作為基本限制，另一個邏輯則用以改善基本限制；一個邏輯用以發展另一個邏輯；兩者皆互為特例的關係。但就國際制度變遷而言，後果性邏輯的解釋是較為普遍，適當性邏輯的解釋則被認為較不重要。如同費爾翁和溫特（2002: 60-61）所言，此二邏輯的差異在經驗分析國際關係現象上，各有其比較優勢。

五、因果解釋與構成解釋（理解）的爭論

理性主義強調因果解釋而建構主義是重視構成解釋（理解），因果解釋是藉由尋求因果關係而解釋「為什麼」（Why）；構成解釋則是以構成關係尋求理解「什麼」（What）。若是引用郝立斯（Martin Hollis）和史密斯（1990）對於國際關係研究的觀點，也就是理性主義強調解釋國際關係，而建構主義則是重視理解國際關係。建構主義探討人類意識及其在國際關係的角色，因而強調詮釋在研究國際關係的重要性；並認為主流理論的實證主義並無法解釋人類意識，因為人類意識是社會生活的組成（as constitutive of social life），只能以詮釋的方法進行理解其相互主體的意義。並且人類意識決定了人類行動與互動的意義，只能設身處地以行為者的立場去理解其行動的意義（Neufeld, 1993）。因此，建構主義認為邏輯實證論所追求的因果性的理論（causal theory）不是國際關係研究的目的，而構成性的理論（constitutive theory）才是研究國際關係理論的目的。就某種程度而言，建構理論也是一種解釋，而不只是簡單的描述。因為建構性的理論探究國際關係的本質，以及組成國際關係的相關因素，進而重新建構、組成國際關係（現象），以獲得國際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關係的知識，這才是研究國際關係的目的（Wendt, 1998: 101-117）。

建構主義質疑理性主義方法論上的個體論觀點，但兩者之間所爭論的是本體論而不是知識論。因為建構主義並不反對科學解釋或因果解釋，這是與理性主義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對研究關注的不同（Checkel, 1998: 325-327）。其實，若以分析的角度而不是以本體論的角度看待理性主義，則理性主義就能與建構主義的方法論整體主義相容（Fearon & Wendt, 2002: 66-67）。同時，建構主義也能在理性主義（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架構內，進行經驗性研究，也就是建構主義的本體論是可以與實證主義的知識論相容（Dessler, 1999）。簡言之，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對於解釋形式的爭論，是因為各自方法論的選擇，而並非不能相互調整或相容。

伍、此次大辯論的可能發展趨勢

由於此次大辯論尚未完全形成，尚不足以評斷其對於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影響，但仍可以從中發現某些發展趨勢。

一、國際關係研究學科重組的趨勢到來

國際關係學者為引人注意而以「大辯論」（great debate）一詞誇大了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差異，因為兩方學者都並未就彼此之間的差異進行理論辯論。但誠如前三次的大辯論都影響到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而且學者對於國際關係各種不同理論學派之間的爭論進行研究，藉由這些大辯論的研究而理解國際關係理論的歷史發展過程。所以，威佛爾（1996: 175）會認為，此學科似乎藉由各大辯論之間的經常變動，以及各大辯論之間先前各辯論者相遇的時刻，來組織學科本身。因此，一旦學者逐漸以「大辯論」論述之後，這樣的研究趨勢就成形了，此次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辯論就在於重新組織國際關係研究學科。

建構主義從第三次大辯論中脫穎而出，成為此次大辯論的主辯角色，雖然溫特認為建構主義並不是一個世界政治的實質理論，但常被學者用來與真正的實質理論（例如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相比較，這是有問題的。相較於理性主義，建構主義根本不是理論（Fearon & Wendt, 2002: 56）。即使如此，建構主義作為理性主義的辯友，俾能從相互的辯論之中，尋求出組織此學科的方法與內容，尤其是在經驗研究的方面上。

二、經驗研究的爭論為主

根據溫特的觀點，對於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爭論所在，最普遍的詮釋是爭論國際體系的本體論，也就是國際體系是什麼組成的。另一個則是關於經驗性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究議題的爭論，例如結構如何建構認同與利益？以及認同與利益如何持續（Wendt, 1999: 35）但費爾翁和溫特（2002: 67）希望，如果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爭論會是國際關係研究另一場大辯論的話，不要讓它成為是關於本體論的爭論。因為以本體論與經驗性研究的角度詮釋此辯論是會造成更為零合（zero-sum）的景象，而是要能務實地將兩者視為是世界政治理論化的分析工具或分析鏡（Ibid, 52-54）。

其實，在第三次的大辯論中，已經爭論了國際體系的本體論，各方的論點也都已經有所論辯（莫大華，2003: 13-65）。尤其是面對國際理論領域充斥著各種對現實主義的批判，不免有學者要提出這樣的質疑：當前的現實主義理論退化了，還有任何人會是現實主義者嗎（Legro & Moravcsik, 1999: 5-35）？現實主義學者就指出，現實主義必須重新聚焦於經驗性的研究、明定現實主義的適當的解釋範圍、趨向理論綜合（synthesis），以作為重新改造現實主義的參考（Ibid, 45-53）。這項質疑引起許多現實主義學者的回應，在二〇〇〇年夏季號的《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期刊中討論。[10] 就目前的文獻分析，多屬於經驗性研究議題爭論，即是理性主義或建構主義在特定經驗研究個案的解釋力爭議。

三、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相容

隨著學者的經驗實證研究個案增多，發現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是存有許多可以整合的觀點，例如恰克爾認為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都是對的，國際規範對於國內政治有時產生限制效果，有時產生構成效果（Checkel, 1997）。卡爾（Miles Kahler, 1999: 296-298）也認為在形成行為者認同體的觀點上，建構主義並不是不能與理性主義觀點相容的，是可以互補的。溫特（1999: 318-336）也以「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與「文化選擇」（cultural selection）作為認同體形成依據的邏輯，並以後者的機制（模仿與社會學習）指出，建構主義與理性主義在認同體形成及結構變遷上，並不是互斥的而是社會過程的不同面向。溫特（1992: 425）就曾說過：「如果他們可以藉由知識論考量（國際關係的實質），則自由主義觀點強的學者與建構主義觀點強的學者是有很多可以相互學習的地方。」遂有些學者嘗試整合新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而成為「自由建構主義」（Liberal Constructivism）或「新自由建構主義」（Neo-Liberal Constructivism）（Risse-Kappen, 1996: 365-372；Checkel, 1997；McSweeney, 1999: 203-207）。同時，「美國政治學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的一九九八年會中，更有「現實主義者的建構主義，建構主義者的現實主義」小組（Realist Constructivism, Constructivist Realism）。由此觀之，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辯論發展趨勢，將會隨著越來越多的經驗研究個案發現，而呈現出兩者之間相容、互補的觀點。

[10] Peter D. Feaver et al., (20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後現代主義與建構主義的匯合

隨著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的大辯論發展，後現代主義與建構主義在面對共同「敵人」（理性主義）時，基於強化批評主流理論的論述能力，兩者的理論論述必須會產生某種程度的匯合。誠如上述，有些學者提議後現代主義與建構主義進行匯合，藉由建構主義重新反思後現代主義的觀點。建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匯合是否會是國際關係理論的新發展趨勢呢？對於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又有何影響呢？尤其是在學者如何掌握國際關係理論的哲學論述與評析上。這些都是目前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所欠缺，而卻是必須探索的重要議題。從范爾基（Karin M. Fierke）和喬錦森（Knud Erik Jorgensen）所編的《建構國際關係：下一世代》（*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Next Generation*）一書中，可以觀察出這個趨勢，例如喬錦森（2001）將建構主義區分成四個層次：哲學、後設理論、理論化及經驗研究，藉以釐清對建構主義的混淆及內部的差異。此外，馬席爾（Valerie Marcel, 2001）也建議引用「詮釋學」（Hermeneutics）作為解決建構主義內部的知識論不一致，以及實證主義在（實體）構成與解釋的問題，還有後現代主義的主觀主義問題。

陸、結　論

國際關係理論實為國際關係實務、現象的論述系絡，隨著不同的理論論述系絡而對於國際關係實務有著不同的論述。所謂國際關係理論的「大辯論」，即在展現各種新理論與既有理論之間的爭論，它不僅是爭論理論論述的系絡，更是對於國際關係實務的爭論。就其是否有助於學者認識與理解國際關係本質而言，蘇米德（Brian C. Schmidt, 2001）就曾思考是否藉由各次大辯論能真的理解國際關係研究的歷史發展？甚至學者重新檢視以前的大辯論，也發現許多的誤解與誤判（莫大華，2003: 58-62）。然而，無論如何，藉由國際關係理論的辯論史是有助於理解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歷史，也就能理解特定理論學派出現的環境系絡。但要論述大辯論是否有助於理解國際關係本質，這就要涉及更深層的科學哲學之議題，例如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能否探索出「普遍理論」（general theory or grand theory）？理論是否能呈現（描述）本質？解釋現象本質？預測現象本質？事實上，國際關係理論只是學者之間的不同觀點而已，藉由理論的大辯論是有助國際關係學科建立其本身的認同，以及後續學者認識此學科的理論發展經過。

學術理論辯論常是始於非主流理論批判主流理論，它促使學者重新反思其學科本身的發展與研究，這正是各次大辯論的重要貢獻之一。從各次大辯論之後，國際關係學者對於理論研究的加強，說明了大辯論的確有助於增長國際關係的理論知識。尤其是第三次大辯論引發學者重新思考國際關係研究，但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超越第三次大辯論，並反思地關切國際關係理論本身的存有、研究工具、知識，而重新界定此研究領域。然而，國際關係的主題，使它成為一門政治化的學科，並影響到學者閱讀文本的方法，以及理論化此世界的方法。因而，在分析的對象及研究的範圍（即研究的層次）、社會研究與政治研究的目的，以及研究國際關係的適當的方法論、國際關係研究的差異性等四點上，各研究途徑都有所不同。但就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而言，以國際關係主題的複雜性，以及理論預測所與生俱來的哲學問題，各種不同的研究途徑只是強調重點或面向的差異，而非典範的競爭或研究綱領（research program）的進步或退步，它都是有助於國際關係理論知識的增長。

此外，對於國際關係理論大辯論的研究是希望協助國內學界理解國際關係理論歷史，而非局部與片段地認識個別的國際關係理論。所以，若能以學者觀點來理解國際關係理論的話，就較能持平地看待國際關係理論大辯論了。

尚無法斷言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辯論，已經是一場盛行於歐美國際關係理論學界的「大辯論」，但隨著學者不時出版相關的論述，勢必終將引發學者有系統地分析此次的「大辯論」。不容諱言，國際關係理論的各次大辯論中，各理論之間仍是存有相容的空間，即使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對於許多議題存有不同的觀點，但隨著經驗研究的個案發現，雙方的論點是可以相容、互補的。任何極端的理性主義或是建構主義都會被邊緣化，仍處於異議、另類的國際關係理論。換言之，此次的大辯論是會產生綜合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兩方觀點的新觀點（neo-perspectives）。總之，這意味著國際關係理論之間並不是存在著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而是可以發現某種程度的共量性作為相互綜合的基礎。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王晶譯，1999，《後現代性的起源》，Perry Anderson,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nity*，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石之瑜，2000，〈現實主義國際政治學的知識脈絡〉，《問題與研究》，39, 7: 37-53。

————，2001，〈做為藝術的政治學—兼評建構主義的科學哲學立場〉，《美歐季刊》，15, 2: 293-310。

林文斌，2002，〈國際典則理論與經驗的對話：以國際銀行監管中的巴塞爾協議及協定為例〉，《問題與研究》，41, 6: 25-60。

高宣揚，1999，《後現代論》，台北：五南圖書公司。

袁　易，1999，〈『安全典則』與美中關係：一個認知社群的分析架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收錄於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頁 389-432，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2001，〈對 Alexander Wendt 有關國家身份與利益分析之批判；以國際防擴散建制為例〉，《美歐季刊》，15, 2: 265-291。

———，2002，〈權力、利益與認知:美國與中共軍事交流之弔詭〉，裘兆琳主編，《中美關係專題研究：1998　2000》，頁 151-189，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袁鶴齡，2000，〈國家認同外部因素之初探—美國因素、中國因素與台灣的國家認同〉，《理論與政策》，14, 2: 141-163。

莫大華，1999，〈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問題與研究》，38, 9: 93-109。

———，2000，〈治絲愈棼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對黃旻華先生的評論之回應〉，《問題與研究》，39, 11: 95-101。

———，2002，〈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的原型、分類與爭論－以 Onuf、Kratochwil 和 Wendt 的觀點分析〉，《問題與研究》，41, 5: 111-148。

———，2003，《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安全研究》，台北：時英出版社。

黃旻華，2000，〈評「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問題與研究》，39, 11: 71-94。

黃訓慶譯，2001，《後現代主義》，Richard Appignanesi, *Postmodernism*，台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

盧業中，2001，〈主要國際關係理論中心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與建構主義之比較研究〉，《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9, 2: 21-52。

二、英文部分

Adler, Emanuel, 1997, Seizing the Middle Ground: Constructivism in Worl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 3: 319-363.

———, 2002,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95-118,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Albert, Mathias, 2001, What Systems Theory Can Tell Us About Constructivism, in Karin M. Fierke and Knud Erik Jorgensen, eds.,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Next Generation*, pp.93-111, New York: M. E. Sharpe.

Ashley, Richard K. and R. B. J. Walker, 1990, Reading Dissidence/Writing the Discipline: Crisis and the Question of 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4, 3: 367-416.

Beer, Francis A. and Robert Hariman, 1996, Realistic Rhetoric but not Realism: 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enatorial Conversation on Cambodia, in Francis A. Beer and Robert Hariman, eds., *Post-Realism: The Rhetorical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369-383,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Bleiker, Roland, 1998, Retracing and Redrawing the Boundaries of Events: Postmodern Interferences with International Theory, *Alternatives*, 23, 4: 471-497.

Bloom, William, 1990, *Person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oth, Ken, 1997, Security and Self: Reflections of a Fallen Realist, in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C. Williams, eds.,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Concepts and Cases*, pp.83-119,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Brooks, Stephen G., 1997, Dueling Realis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1, 3: 445-477.

Brown, Chris, 1999, Critical Theory and Postmodern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J. R. Groom and Margot Light, eds,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Guide to Theory*, pp.60-61,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Chan, Stephen, 1998, An Ontologist Strikes Back: A Further Response to Hollis and Smith,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4, 3: 441-443.

Checkel, Jeffrey T., 1997,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Domestic Politics: Bridging the Rationalist- Constructivist Divid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 4: 473 -495.

Checkel, Jeffrey T., 1998,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orld Politics*, 50, 2: 324-348.

————, 1999, Norms, Institutions,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Europ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3, 1: 83-114.

————, and Andrew Moravcsik, 2001, A Constructivist Research Program in EU Studies? (Forum Debate),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2, 2: 219-249.

Christiansen, Thomas, Knud Erik Jorgensen and Antje Wiener, eds., 2001,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urop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Cortell, Andrew P. and James W. Davis, Jr., 1996, How D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atter? 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0,4: 451-478.

————, 2000, Understanding 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Norms: A Research Agenda,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 1: 65-87.

Der Derian, James, 1989, Spy vs. Spy: The Intertextual Power of International Intrigue, in James Der Derian and Michael Shapiro, eds., *International/ Intertextual Relations: Postmodern Readings of World Politics*, pp.163-1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oronto: Lexington.

————, 1991, S/N: International Theory, Balkanisation,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Millennium*, 20, 3: 485-506.

————, 1992, *Antidiplomacy: Spies, Speed, Terror, and War,* Oxford: Blackwell.

Desch, Michael C., 1998, Cultural Clash: Ass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Ideas in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1: 141-170.

————, 1999, The Author Repl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 1: 172-180.

Dessler, David, 1999, Constructivism within a Positivist Social Scien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5, 1: 123-137.

Devetak, Richard, 1996, Postmodernism, in 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Linklater, ed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81-208,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Doty, Roxanne Lynn, 1997, Aporia: A Cri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atiqu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 3: 365-392.

————, 1999, A Reply to Colin Wigh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 3: 387-390.

Doucet, Marc G., 1998, Standing Nowhere(?): Navigating the Third Route on the Question of Foundation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Millennium*, 28, 2: 289-310.

Duffield, John S. Theo Farrell, and Richard Price, 1999, Correspondence: Isms and Schisms: Culturalism versus Realism in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 1: 156-172.

Fearon, James and Alexander Wendt, 2002, Rationalism v. Constructivism: A Skeptical View,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52-72,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Feaver, Peter D. et al., 2000, Correspondence: Brother, Can You Spare a Paradig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1: 165-193.

Fierke, Karin M. and Knud Erik Jorgensen, eds., 2001,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Next Genera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Finnemore, Martin, 1993,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s Teachers of Norms: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and Science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7, 4: 565-598.

————, 1996, Constructing Norms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pp.153-18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rankel, Benjamin, 1996, Restating the Realist Case: An Introduction, *Security Studies*, 5, 3: xiv-xx.

Frederking, Brian, 1998, Resolving Security Dilemmas: 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35, 2: 207-232.

Friedman, Gil and Harvey Starr, 1996, *Agency,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Ontology to Empirical Inquiry*, London: Routledge.

George, Jim, 1994, *Discourse of Global Politics: A Critical (Re)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ulder: Lynne Rienner.

Grieco, Joseph M., 1988,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5, 3: 485-508.

Grieco, Joseph M. Robert Powell, and Duncan Snidal, 1993, The Relative-Gains Proble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 3: 729-743.

Guzzini, Stefano, 2000, A Re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6, 2: 155-174.

Halliday, Fred, 1994,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ancouver: University British Columbia Press.

————, 1998, States, Discourses, Classes: A Rejoinder to Suganami, Forbes and Palan, *Millennium*, 17, 1: 77-80.

Hansen, Lene, 1997, R. B. J. Walk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constructing a Discipline, in Iver B. Neumann and Ole Waever, eds.,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sters in the Making?*, pp.319-324, London: Routledge.

Hobson, John M., 2000,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llis, Martin, 1992, Structure and Action: Further Com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8, 2: 187-188.

Hollis, Martin and Steve Smith, 1990,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1, Beware of Gurus: Structure and Ac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7, 4: 393-410.

————, 1994, Two Stories about Structure and Agen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 3: 241-251.

————, 1996, A Response: Why Epistemology Matters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2, 1: 107-110.

Huysmans, Jef, 1997, James Der Derian: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Theory, in Iver B. Neumann and Ole Waever, eds.,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sters in the Making?*, pp.354-355, London: Routledge.

Jabri, Vivienne and Stephen Chan, 1996, The Ontologist Always Ring Twice: Two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ore Stories about Structure and Agency in Reply to Hollis and Smith,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2, 1: 107-110.

Jackson, Robert, 1996, Is There a Classical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tivism and Beyond*, pp.203-2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arvis, Darryl S. L., 2000,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Postmodernism: Defending the Discipline*,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Jepperson, Ronald L.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1996,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pp.33-7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Jupilles, Joseph James A. Caporaso and Jeffrey T. Checkel, 2002, Integrating Institutions: Theory, Method, and the Study of the European Union, *ARENA Working Paper*, WP 02/27.

Kahl, Colin H., 1998, Constructing A Separate Peace: Constructivism, Collective Liber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c Peace, *Security Studies*, 8, 2/3: 94-144.

Kahler, Miles, 1999, Rati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Peter J. Katzenstein, Robert O. Keomane, and Stephen D. Krasner, eds.,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pp.279-301,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Katzenstein, Peter J. ed., 1996,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atzenstein, Peter J., Robert O. Keohane, and Stephen D. Krasner, 1999,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Peter J. Katzenstein, Robert O. Keohane, and Stephen D. Krasner, eds.,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pp.5-45,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Keohane, Robert, 1988, International Institute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2, 4: 379-396.

Legro, Jeffrey W. and Andrew Moravcsik, 1999,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 2: 5-35.

Linklater, Andrew, 2001, Rationalism, in Scott Burchill et 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03-128, New York: Palgrave.

Lynn-Jones, Sean M. and Steven E. Miller, 1995, Preface, in Michael E. Brow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p. ix-xiii, Cambridge: MIT Press.

Lyotard, Jean-Francois,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acMillan, John and Andrew Linklater, eds., 1995, *Boundaries in Question: New Direc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Maiguashca, Bice, 2000, Theorsing Politics in 'No Man's Land': Feminist Theory and the Fourth Debate, in Michi Ebata and Beverly Neufeld, eds., *Confronting the Political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23-15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Marcel, Valerie, 2001, The Constructivist Debate; Bringing Hermeneutics (Properly) I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1 ISA Conference, 21 February 2001, Hong Kong.

March, James G., 1994, *A Primer on Decision-Making: How Decisions Happe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March, James G. and Johan P. Olsen, 1989,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1998, 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4, 4: 943-969; reprinted in Peter J. Katzenstein, Robert O. Keomane, and Stephen D. Krasner, eds.,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pp.303-329,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McSweeney, Bill, 1999, *Security, Identity and Interest: A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earsheimer, John J., 1990,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 1: 5-56.

————, 1994/1995,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3: 5-49.

Mitchell, Ronald B., 2001, Norms as Regulative Rules: Inducing Compliance Through a Logic of Appropriatenes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onference, San Francisco, Ca., 30 August-2 September 2001.

Moravcsik, Amdrew, 1995, 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Regimes: Liberal Theory and West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 2: 157-189.

Nadelmann, Ethan A., 1990, Global Prohibition Regimes: The Evolution of Norm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4, 4: 479-526.

Neufeld, Mark, 1993, Interpretation and the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 1: 39-61.

————, 1994, Reflexiv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Claire Turenne Sjolander and Wayne S. Cox, eds., *Beyond Positivism: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1-35,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Onuf, Nicholas G., 1989,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Osterud, Oyvind, 1996, Antinomies of Postmodernism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3, 4: 385-390.

Owen, John M., 1998, Pessimistic Constructivism: Common Identities, Common Enem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Boston, September 2-5.

Patomaki, Heikki, 1996, How to Tell Better Stories about Worl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 1: 105-133.

Pettman, Ralph, 2000, *Commonsense Constructivism: Or The Making of World Affairs*, London: M.E. Sharpe.

Pollack, Mark A., 2000,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EUI Working Paper*, RSC No.2000/55.

Powell, Robert, 1991, Absolute and Relative Gai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 4: 1303-1320.

Price, Richard and Christian Reus-Smit, 1998, Dangerous Liaisons? Critical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Constructivism,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4, 3: 259-274.

Reus-Smit, Christian, 1997,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Nature of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1, 4: 555-589.

Richardson, James L., 2001, *Contending Liberalism in World Politics: Ideology and Power*, Boulder: Lynne Rienner.

Rise, Thomas et al., eds., 1999, *The Power of Principles: The Socialization of Human Rights Norms and Domestic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isse, Thomas, 1998, The Soci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Norms into Domestic Practices: Arguing and Strategic Adaptation in the Human Rights Are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deas, Culture and Political Analysis Workshop*,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May 15-16, 1998.

Risse, Thomas and Kathryn Sikkink, 1999, The Soci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ms into Domestic Practices: Introduction, in Thomas Risse, et al., eds., *The Power of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Domestic Change*, pp. 1-3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isse-Kappen, Thomas, 1995, Democratic Peace—Warlike Democracies?: A Social Constructiv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Liberal Argu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 4: 491-517.

————, 1996, Collective Identity in a Democratic Community: The Case of NATO,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pp.357-39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ose, Gideon, 1998,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51, 1: 144-172.

Ruggie, John Gerard, 1998,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 4: 855-885.

——, 1998, *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ty: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Schimmelfennig, Frank, 1998/1999, NATO Enlargement: 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Security Studies*, 8, 2/3: 198-234.

Schmidt, Brian C., 2001, On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3-22,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Smith, Steve, 1995, The Self-Images of a Discipline: A Genea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pp.1-37,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1997, New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pp.165-19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1, Reflectivist and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224-24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nyder, Jack, 1991, *Myth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pegele, Roger D., 1992, Richard Ashley's Discours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21, 2: 147-182.

————, 1996, *Political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ever, Ole, 1996,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pp.149-18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lsh, James I., 2001, National Preference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Evidence from European Monetary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5,1: 59-80.

Webb, Keith, 1998, Preliminary Questions about Postmodernism, URL>http://ww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ukc.ac/politics/publications/journals/kentpapers/webb4.html

Wendt, Alexander, 1991, Bridging the Theory/Meta-Theory Gap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7,4: 383-392.

————, 1992a,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2: 391-425.

————, 1992b, Levels of Analysis Vs. Agents and Structure: Part III,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8, 2: 181-185.

————, 1994,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 2: 384-396.

———— and Daniel Fredheim, 1995, Hierarchy under Anarchy: Informal Empire and the East German St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 4: 689-721.

————, 1998, On Constitution and Caus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4, Special Issue: 101-117.

————,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ght, Colin, 1999, They Shoot Dead Horses Don't They? Locating Agency in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atiqu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 1: 109-142.

————, 2000, Interpretation All the Way Down? A Reply to Roxanne Lynn Do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6, 3: 423-470.

Wight, Martin, 1991,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ationalism v. Constructivism:

Another Great Debate for Com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ahua Mo*

Abstract

Rationalism vs. constructivism is an ongoing great deb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RT), the debate topics are on: 1) materials matter or ideas matter in shaping agency's behaviors.2)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effects. 3) identity 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norms compliance. 4) logic of consequences or appropriateness mode of decision-making. 5) explanation or understanding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is great debate will bring about to reorganize the IRT itself, an empirical research's dominance in IRT, neo-perspectives which integrate the ration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and the convergence of constructivism and postmodernism.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ationalism, Constructivism, Postmodernism.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Fu Hsin Kang Colle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